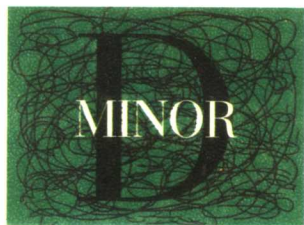


人文译丛
总主编 ◆ 何怀宏

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书系



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 = 著 殷冬水 曾水英 李安平 = 译

和平的保卫者(小卷)

D e f e n s o r M i n o r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人文译丛
总主编 ◆ 何怀宏

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书系

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 = 著 殷冬水 曾水英 李安平 = 译

和平的保卫者(小卷)

D e f e n s o r M i n o r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平的保卫者:小卷/(意)马西利乌斯著;殷冬水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9(人文译丛)

ISBN 7-206-04470-0

I. 和… II. ①马… ②殷… III. 政治理论—意大利—中世纪 IV. D09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0545号

Defensor minor

Marsiglio of Padua

和平的保卫者(小卷)

著者: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

责任编辑:崔文辉 封面设计:闫志杰等 责任校对:赵秋实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 话:0431-5649710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5.625 字 数:14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470-0/A·19

版 次:2004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定 价:12.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芭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需。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的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久违的观念冒险

——译者序^①

一、引 言

中世纪的政治哲学，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息，具有神秘的诱惑力。

然而，我们仍没有勇气去涉足这一神圣的空间。上帝、天使、耶稣以及圣经中的每一个神奇故事，都太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只能将《圣经》当作“故事”来欣赏，我们无法洞见其字里行间的真实含义。政治哲学家，以创造故事为职业，故事给予他们太大的想象空间，但须要记住的是，像自然状态、社会契约等，都不是思想家们所进行的无意义的虚构，它们是人类政治思维成就的象征与标识。

《法律与宗教》^②，将西方的法治文明回溯到对上帝的信仰之中；

《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③，反复告诫读者，基督教是支撑宪政事业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力量；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④，它最惊人的力量就在于它论证了近代人的历史思维与中世纪人的历史思维的一致性，启蒙时期的进步史观只不过是救赎史观的世俗化形式而

已；

……

不了解中世纪的政治哲学，就不可能理解政治的现代性。

然而，我们对这一时空内的个人生活史^⑤了解太少；我们无法想象近代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基督教之间还存在什么关系^⑥；我们更无法想象孔多塞与奥古斯丁、马克思与先知之间还存在什么思想上的亲缘性^⑦。

中世纪人有太多的成就，他们锻造了霍布斯、洛克以及卢梭等思想家所需要的思想工具；他们给予人类宝贵的内省方法^⑧；他们塑造了人类的幽暗意识^⑨；他们也培养了具有德行的基督教公民；阿奎那、但丁、马西利乌斯、马基雅维里……，真可谓群星璀璨，光彩照人。

我们行囊空空，我们开始了一次久违的思想冒险。

马西利乌斯善于打造迷宫，在他的作品中，游荡着戴着面具改头换面的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教皇、教士、皇帝、俗人也不行走于字里行间；腓力四世、路德维希、约翰二十二世等，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穿行于法国、意大利、德意志的城堡与森林之中！

让我们进入这个迷宫，去感受马西利乌斯的智慧与成就吧！

二、马西利乌斯的政治哲学：三种传统与现代性

马西利乌斯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徘徊于三种思想传统之中，这种摇摆性，这种思想上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本身就是由生活的复杂性所决定的。马西利乌斯不会自寻烦恼，将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他必须处理两种权力与两个王国之间内在的冲突，他必须为世俗政治

的正当性提供不同于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人提供的证明，同时，他必须在保持三种思想传统之间的张力的同时，寻求三者之间的和解。这一事业本身就是引人入胜的，同时也是极具挑战性的。马西利乌斯也正是在应对这些政治难题的过程中，展示其卓尔不群的智慧与敏锐的学术感觉力的。

马西利乌斯，又称马西利奥，生于1275年到1280年之间，1313年出任巴黎大学校长一职，他和彼特以及其他领袖性的阿威罗伊主义者素有交情。1324年，也就是在托马斯·阿奎那去世之后五十年，同时也就是在但丁死后三年，他完成了他的惊世之作《和平的保卫者》。1326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对此著述进行了审判，这迫使马西利乌斯逃离巴黎，投奔路德维希门下。他死于1342年。

马西利乌斯的辉煌成就，完全仰仗于他作为《和平的保卫者》（大小两卷）一书的作者身份。《和平的保卫者》一书，令当时的人们不寒而栗，当教皇、主教以及作家只是关注保存社会秩序，希望惩罚异端——路德——之时，他们指控路德及其信徒从马西利乌斯那里接受了诸多观念，并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现代人常常将马西利乌斯和马克思相类比，在现代人看来，这样的类比并非毫无意义，因为两人都使他们自己与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机构和思想观念相对抗，两人都表达了对这些机构的仇视，展示出他们理想的政治图景。对《和平的保卫者》的研究，将使我们了解现代生活与政治思想的来源与主要特征，它预示了现代性政治的诸多因素与开端，在马西利乌斯诅咒性的同时也是激情四射的论证下面，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他对人类生存的境况作出了当时人所无法接受的分析，它提出了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颇有见地地提出了有关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和平的保卫者》一书，它和任何一部伟大的政治著述一样，都对人类所追求的价值之间的冲突与平衡，提

出了大胆而精致的设想。因此，马西利乌斯的贡献就在于如下这一事实，有关人类永恒的政治难题，他不仅提出了新的见解，而且他的见解为历史发展方向所验证，他的分析能够为我们理解和应对那些一直处于争论之中的政治难题，提供有益的教诲。

在《和平的保卫者》一书中，马西利乌斯为我们呈现出了三种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思想主题与思想传统^⑩，这些主题，这些传统，迄今仍活跃在现代人的政治思维之中。马西利乌斯认为：(1) 国家是理性的产物，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过上优良的生活；(2) 政治权威主要关注冲突的解决，被强制性权力的占有和构成所阐释；(3) 合法政治权力的唯一来源是人民的意志或者同意。因此，在马西利乌斯的政治哲学中，他秉承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美德政治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开启了马基雅维里、霍布斯的权力分析式的实证主义传统；同时，他也弘扬了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传统，预示了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的民主传统。

(一) 马西利乌斯与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传统

在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美德政治学中，城邦与家庭永远就是两个相互冲突的神圣空间。“根据古希腊人的思想，人类建立政治组织的能力与建立自然组织的能力相比不仅不同，而且是截然相反的。自然组织的中心是家(oikia)与家庭。城邦国家的兴起意味着人们获得了除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即他的 bios politikos。”^⑪如果说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初级社会组织形式，那么，城邦则是人类社会的高级社会组织形式。家庭作为一个小型社会，它满足的是人最基本的底层次欲求，它负责物质生产和人类的繁衍，尤其为战争提供足够的成年男性。家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不平等，就是充满了“暴力”。而城邦则完全不同，它是公民活动的神圣空

间。“言”与“行”是公民的生存方式。同时，城邦也是公民实现其德行的场所。家庭生活与城邦生活，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生活境界。当亚里士多德假定“人在本性上是城邦动物”之时，他试图表达一个有关人的完整性概念。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进入城邦政治生活，追求“卓越”的政治美德的公民，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人。因此，“城邦与家的不同在于它只认‘平等’，而家庭则是最严厉的不平等的中心。……在家庭领域里，自由是不存在的，因为它的主人，即家长只有在他有权离开家庭并进入人人平等的政治领域时，他才被认为是自由的。”^⑫因而，“希腊所有的哲学家（不管其如何反对城邦生活）都认为以下几点是理所当然的：自由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必需品主要是一种前政治的现象，是私有的家庭组织的特征；强制与暴力在这个领域里是正当的，……暴力是一种使自己摆脱生活必需品的困扰从而进入自由世界的前政治的行为。”^⑬而城邦的政治生活，则是成年男性展示其卓越的政治美德的场所，也是使人成为人的理想教化领域，体育训练、战争观摩、奥林匹亚运动会以及选美比赛等，都是这种政治教化的重要形式。对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而言，公民是成年男性，他们是有勇气走出家庭生活的人，进入政治生活，就意味着他们先验地假定公共善的存在，也意味着公共善在逻辑上优先于个体的善。放逐比死亡更可怕，因为这意味着放逐之人将失去整个城邦之神的关照。公民应该勇敢、节制、智慧与正义。

亚里士多德承先师柏拉图的教诲，沿袭其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倾向，认为“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

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⑮。城邦是由家庭、村坊成长而来，城邦的秩序建立在正义基础上，而城邦的正当性证明依赖于它对善目的实现程度。这些善目，不仅仅停留在现代社会的物质性层面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善的生活层面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善的生活包括道德活动和心智活动。……国家为道德活动提供了更适合的领域，更多样化的关系，……国家不是仅仅按照约定而存在的，而是根植于人性之中，国家的实质就其最真实的意义而言，不是在于人类生活的起源，而在于人类生活的目标；文明的生活并不偏离遐想的高尚的原始生活；国家不是对自由的人为限制，而是获得自由的手段。”^⑯因而，虽然道德教育在许多人看来是教会的天然职责，而“亚里士多德却毫不迟疑地把它赋予国家。”^⑰

总之，这种理性主义的政治思想传统具有如下特点：（1）国家是通过理性的道德目的来解释的，国家的正当性就在于它能够促使人们去实现这些理性的道德目的。国家的善目不能只停留在生存层面，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或者城邦作为一种崇高的存在，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服务于崇高的目的，提升人的生活境界，使人成为人，使人感觉到生活的意义与自身存在的价值，城邦就是古希腊公民的精神家园，因而“希腊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精神只有在一个精神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完美而高尚的生命。”^⑱毫无疑问，城邦就是这样的精神共同体；（2）国家或者城邦被看作是理性之目的或者价值的工具和体现，因而，政治权威只有遵从了理性的道德要求，使

人们过上一种德行生活，它才是合法的；(3) 以此推论，政治义务的基础就是政治权威促使人们实现的道德目的或者价值上，换句话说，政治服从的理由就是政治权威所指向的道德目的，这样的善目成为公民政治服从的最充分理由；(4) 法律就是理性和正义；(5) 主权属于最优秀者，属于那些最具智慧的人。

然而，马西利乌斯在国家理论方面对亚里士多德保持着怎样的忠诚和背离？

毫无疑问，在《和平的保卫者》一书中，马西利乌斯对亚里士多德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忠诚，其“做法是将亚里士多德的字汇直接代入中古全盛期的政治理论中”^①。如同亚里士多德那样，马西利乌斯将国家视为一个自然的有机体，在他看来，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使人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 (the sufficient life)。马西利乌斯将国家看作是自然地形成的一种有机体，由各种不同部分组成，各个部分都对整体生活有其不同的贡献。和柏拉图强调一致性相反，亚里士多德十分注重城邦的异质性构成。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完全类似的人们是组织不成城邦的”^②，划一化的结果只能是城邦本质的消失。“如同一切有机体的政治思想家，马西利乌斯特别担心一个病理可能性，亦即如果有些部分想组它们自然就不适合做的事情，可能给整体造成功能失调。”^③如果我们仔细地研读《和平的保卫者》，我们便会清楚地发现，马西利乌斯“全神贯注的根本不是宪政，而是国家的安定和统一。事实上，政治秩序的存续是高于一切的考虑”^④。马西利乌斯与他的古希腊前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生霍布斯一样，对“政治秩序”投入了极大热情。但和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马西利乌斯将这种政治秩序作为其政治理论的最高价值，他并不认为政治秩序必须符合一些先验的正义标准才是人们可欲的政治秩序，而这一

点是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这一点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暗示了马西利乌斯对亚里士多德的背离。如果说政治生活具有一定目的，那么，在马西利乌斯看来，这种目的只是政治秩序，而非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正义的秩序。因此，在马西利乌斯那里，如同在后来的马基雅维里那里那样，政治学所追求的目标大大降低了。因而，马西利乌斯认为，“正义对他来说不再是据以评价政治秩序的超验标准，而是‘人类交往的结果和派生物’。”^②马西利乌斯认为，所谓的和平，所谓的政治秩序，就是组成国家或者政治共同体的要素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的保持要求柏拉图所说的“各司其职”。因此，在这种对政治秩序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到马西利乌斯对教皇不满的最终原因，教皇对世俗政治权力的僭越，就是维系和平的最大敌人。在马西利乌斯看来，教皇不安守其本分，干预世俗事务，是最不能令人容忍的。因此，理所当然地，马西利乌斯集中火力炮轰教皇，指责了教会体制的弊端，讨论了教皇权力的边界、性质等复杂问题。

我们知道，“对全体希腊人来说，城邦就是一种共同生活；……城邦的宪法是一种‘生活模式’而不是一种法律结构；因此，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③为了追求这种和谐，分析城邦的构成要素是希腊政治哲学家政治分析的前提之一。柏拉图假定了城邦就是个人的放大，假定了个人的灵魂构成与城邦构成之间有着一致的对应关系，在逻辑上，自恰地论证了城邦的三个组成部分的人员、作用、功能以及必须具备的政治美德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柏拉图才展示了他对正义问题的独特理解。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不仅忠诚其导师的学说，而且也试图在正义理论上超越其导师的论证，使正义诸理论更加丰满，更加精致化。“亚里士多德把国家分成不同‘部分’或阶层：提供生活必需

品的农夫和工匠、保存财富的商人、保卫国家的武士、管理国家的执法者以及指导精神生活的祭司。”^④马西利乌斯也追随亚里士多德，对国家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富足的国家生命需要农民、工匠、士兵以及商人，同时更需要一个用来“止纷争”的政府。在马西利乌斯政治哲学中，国家原初地被设想为一种存在，这种存在是为了使人们过上优良的生活。国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国家是一种完美的存在。国家的组成部分应该按照它关心的不同人类功能来定义：农夫是为了营养功能；艺术家是为了情感功能；而政府的功能则是维护秩序，为富足生活的实现创造条件，因此，政府影响的是人们现世生活的幸福；教士的功能则是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进行指导性和规劝性而不是强制性的管理，他们影响的则是来世的富足生活。因此，既然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由那些组成优良生活的功能来解释的，那么，最为重要的是每一部分必须发挥它的作用，而不干涉其他组成部分的作用的发挥；实际上，国家的和平，如同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一样，存在于这种有序的相互关系之中。为了实现秩序，统治及其政治权力机构是必须的。在马西利乌斯看来，这种统治功能属于政府。马西利乌斯不是现代的权力多中心主义的倡导者，我们毋宁说他是霍布斯的先驱，他们最突出的一个成就就是对一元权力中心的坚持，反对“政出多门”。当霍布斯将人假定为欲望的动物，将自然状态假定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的时候，他看重的是政治权力的整合功能。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人类有如一堆散沙般的各自独立的有机体，而国家则是通过批准把这些有机体强行地捏在一起的外部力量。同时，建构政治秩序，还必须依赖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政治权力必须集中在一个统治机构之中。马西利乌斯也十分强调世俗权力的强制性性质，强调世俗政治权力的一元论。因此，他反对教皇主义者对教皇权力的

和平的保卫者 (小卷)

论证。就政体理论而言，马西利乌斯认为，评价政体优良与否的标准就是看政府是否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一个人的统治、少数人的统治或者所有人的统治的政体形式，每一个可能是优良的政体，在它们之中作出选择只是由特殊的环境而不是由基本原则的不同来决定的。同时，马西利乌斯还保留着现代人看来是“歧视性的看法”，他认为，并不是国家的所有组成部分对富足生活的实现都作出了同等的贡献，因为食物、住房以及金钱是国家存在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富足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他将农夫、匠人、财政人员等，称为“普通大众”，而将统治者、教士以及士兵看作是“荣誉阶级”。

西方法治传统，根植于古希腊政治传统之中，这也是伯利克里在《葬礼演说辞》中展示的一个雅典城邦政治成就^②，他也试图通过夸夸其谈之辞，勾起雅典人民对过去辉煌的回忆，激起他们战胜瘟疫、克服战争困难的斗志。柏拉图主张的是哲学王的人治，而不是法治。这已成为不言而喻的常识。如果说柏拉图对西方法治文明还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么他的贡献就在于他对法治理想的反对与挑战上。因为，正是他在对法治理想的反对中，柏拉图如同一个解剖师那样，将法治的弊端呈现在他的读者面前。亚里士多德为后人所称道，就在于他坚守“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人生信条和治学理念。他敢于反对其精神导师柏拉图。他不赞成柏拉图的“共产共妻”的设想，同样他也认为哲学王实在太飘渺，他主张法治而不是人治。马西利乌斯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在他看来，既然一个正义的政体是这样一种政体，它的目标在于公共利益，因此，政府的功能必须为法律所管理，法律是有关实现优良生活的人类行为的“标准”或者“准绳”。

如果说马西利乌斯在政治哲学上不折不扣地忠实地奉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路线，那么，托马斯·阿奎那就足以使他相形见绌了。

马西利乌斯的辉煌成就就在于，他“以非常不同的精神运用亚里士多德。”^②需要讨论的是，马西利乌斯是否忠诚地保持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如果不是，他在什么意义上，或者说在哪些方面背离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传统？

马西利乌斯的政治哲学令人费解之处就在于“他把自己打扮成亚里士多德的严格的追随者、‘神圣的哲学家’、‘非基督教的圣哲’”^③。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马西利乌斯的“写作艺术”^④，这一写作艺术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可以隐匿作者的一些真实想法。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背离亚里士多德必须以表面上赞成的方式来进行。马西利乌斯明确地赞成亚里士多德关于共和国意图的见解：共和国之存在是为了美好的生活。同样，“马西利乌斯明确地赞同亚里士多德关于将共和国及其构成成分的其他类型的原因（物质的、形式的、原动的）之基础的观点。”^⑤然而，马西利乌斯对亚里士多德的背离是存在的。主要体现在：（1）虽然马西利乌斯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坚持了国家的目的论论证，虽然他们都相信秩序和正义对于人类幸福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但马西利乌斯不仅试图降低政治生活的目标，而且更试图回避或者说解除这种目的论的束缚。因为，如果对人类可能的最高目的是政治学惟一的事业，那么，那些最能够为这些目的的实现提供条件的阶级或者组成部分，就应该被分配给最高的政治权威。正是基于这种推论，亚里士多德以及教皇主义者，都支持最具有美德的人的政治统治和教皇的政治统治。因而，马西利乌斯经常或者有意忽略共和国致力于美德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到，“马西利乌斯的著作之标题是多么合适，这一著作是一名保卫者，不是信仰的保卫者，而是和平的保卫者。”^⑥和平成为马西利乌斯政治哲学所追求的主要善业。马西利乌斯的对手，也就是教皇主义者，在目的论上忠实地保持了亚里士多德主义

的路线，这是因为，如果人类是有目的地生活，如果一切事物都是为了实现善业，如果这些目的之间存在等级或者层次上的分殊，那么，理所当然的推论就是，人类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宇宙图式之中，权力的优先性由目的的优先性来规定。因此，教皇的权力高于世俗政治权力的最充分理由就是它所实现目的优先性。对于马西利乌斯来说，他必须反对这种目的论式的论证方式，最便捷的策略就是淡化甚至消除政治哲学中的目的论色彩；（2）虽然马西利乌斯赞成政治权威的使为了使人们过上“富足”的生活，或者说是优良生活。但对这种生活状态的理解，马西利乌斯和亚里士多德存在明显不同。“我们可以说，马西利乌斯心目中，构成充足生活的要素大多是经济的。他所说的充足生活，与亚里士多德的‘良好生活’或托马斯的‘有德生活’不尽相同。这充足的生活，基本上指良好与有德生活的‘先决条件’而言。马西利乌斯身为基督徒与教士，知道人有比充足的生活更高的目标，但他似乎并不认为这些更高的目标是政治学关心的课题。”^②因此，在马西利乌斯的政治哲学中，“据以评判国家好坏的标准甚至已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良好生活’，不是斯多葛主义的自然法，也不是托马斯的自然法与神律。马西利乌斯使用的标准其实是经济上的充足。政府存在的目的是提供和平与秩序，使人能善用上帝透过自然提供的好东西。”^③

总之，严格而论，“马西利乌斯只是半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因为马西利乌斯式国家的目的其实不是亚里士多德追求的目的，而是手段，以此意义而言，马西利乌斯又只是半个托马斯主义者。在亚里士多德，城邦存在的目的是促进最高目的，在托马斯，基督教国家之德是灵魂与上帝终极复合过程的重要部分。马西利乌斯当然没有否认这些目标是好的，是神圣的，但他认为它们本质上不属于国家的目的。马西利乌斯有别于奥古斯丁之处是，他并不因为政治